

为关联的展示中，还是偏重于短推理路径的科学推导，其说服力更强。

在这个方面，科技考古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科技考古的发展更为迅速，每年产出的成果非常丰硕。可能因为这些成果大部分是以英文的形式发表在 国外刊物上，博物馆的考古展陈往往容易忽略，因此丧失了一项重要的信息来源。比如古人的饮食习惯、健康状况、性别差异，甚至迁居历史等，都是可以通过科技考古手段了解的。有关环境背景的重建就更不在话下了，可以包括动植物资源条件的变化、不同资源的时空分布等，有了这些信息，再去 看古人的行为，也就更容易理解了。更进一步，古人在人类演化史、社会发展史上的位置也能更准确地把握。展示行为关联除了要显示科技分析的原理与成果之外，通常有一个做法，就是场景复原。场景复原需要建立在科技分析的基础之上，否则很容易出现想当然的情况。对于观众而言，相比于物质遗存而言，他们更容易理解重建起来的人类行为，在这个层面，可以展示的内容是非常之多的，就新石器时代遗址而言，可以包括生业、手工业、社会组织、祭祀、环境、健康等。也就是说，相关的有关社会重建的研究应该是展陈的主体。

文化意义上的关联性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古人赋予物质遗存的原初意义，一个是在当下的意义。就好比在读《论语》，既要理解孔子所说内容的原义，更要理解这些话在当今时代的意义。对于前者的把握，是不能拘泥于文本本身的，我们生活在孔子之后，更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影响。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比孔子更了解孔子自己的。也就是说，要展示文化意义上的关联性，就一定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后来的历史进程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的。文化意义上的关联性不是普通的，以玉器为例，中国有十分悠久的玉石文化传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至今仍然绵延不绝，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古人赋予玉器的意义，也就只能结合中国文化背景才能理解。在这个方面上的展陈上，天文考古走在前面，它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那就是较好的古今一致性。陶寺遗址出土的天文观测遗迹，是可以进行验证的，类似的还有良渚文化的汇观山遗址（难以置信，它的名字仍然与观察相关）。结合中国的农历传统、当地的农耕文化，无疑能够带来更加丰富的解读。

中国是这个世界少有的文化传统连续的文明体，当你看到八九千年前的上山文化的红衣陶壶的时候，你会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它的形制在后世仍然在流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通读《论语》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儒家思想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在中国观赏考古出土古代遗存的时候，就好像在重读古代经典一般，我们学习先辈的智慧，感受历史的魅力，古今又融为一体。如何去把握古代遗存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其基本途径就是要去发展丰富多样的阐释，仍然如同我们读古代经典一样。同样的展品，可以按照不同的主题或视角，组织多种多样的展览。比如展览砚台，它可以在“文房四宝”“中国书画”“传统书房空间”“传统工艺”等主题中去呈现。就考古展陈而言，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关联性是展陈的基础，如果三个层次的关联性都能充分体现的话，一件器物也可以办一个展览。经典的案例就是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这件器物独占了一个展区。展览除了展示发现的经过、出土的状态等，还有不少的科技考古分析，告诉观众为什么这件器物千年不锈，告诉观众剑身上的装饰是如何制作的。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展览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件越国的器物会发现在湖北，而且是在一个等级不高的小官员墓葬中。越王勾践是历史名人，有关他的故事本身就有不少。越国本来就以善于铸剑著称，文献也有记载。当把这些背景都加入进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展厅都有点放不下了。在主题的选择上，湖北省博物馆的主题更侧重技术工艺上的历史成就，如果采用不同的主题，理论上，这件器物甚至还可以办不同的展览。

主题是组织展览的灵魂，关联性是素材。有趣的是，不少展览主题的确定并不是先行的，而是办展览的过程中，甚至是展览几平要完成的时候才形成。这可能与展陈实践的复杂性相关，展品、时限、资金等都可能成为限制主题的因素，与那些刚性的条件约束相比，主题是可以相对灵活的。主题本来是关联性的引领，现实中更多是与关联性的相互协调。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在刚性约束与主题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非常具有弹性的空间，那就是关联性，也就是上面所说的3C原理。

关联性的揭示来自于考古研究，没有相应的研究，或者说展览的组织者没有系统收集既有的研究成果，或者收集的成果过于局限，那么展览就很可能成为无本之木。关联性本身并不是展览，但是离开它，展陈就会成为“赛宝会”或是华丽辞藻装饰的广告。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作为一名经常参观博物馆的考古研究者，不免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展览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有的则是过眼云烟呢？博物馆展陈有没有暗含的原理呢？这里想就考古展陈讨论一下，或许对博物馆其他方面的展陈也会有所启示。所谓考古展陈，就是展示考古发现与研究，展览立足于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之上，展陈的就是考古所揭示的。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考古人，可以就博物馆陈列发表一些看法。

所谓“3C原理”，“C”就是英文“context”的首字母，3C就是3个context。流行语说，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不过，这里重复三遍“context”，每一遍的含义其实是不同的，它们分别代表考古展陈的不同方面或层次，也代表不同考古学范式所强调的关键内容。三个context对应着当代考古学的三大主流研究范式，抓住了它们，就意味着把握了考古研究的主旨，也意味着抓住了博物馆考古展陈的内核。

“Context”是一个颇难翻译的英文词语，因为它在不同考古学研究范式中的含义并不相同。按照字典的翻译，我们通常会将其译为“背景”“关联”“背景关联”或“情境”等。其核心其实是关联性，又由于部分关联性是暗含的、模糊的，有点类似于背景的存在，所以也称之为背景。我们在讲话中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一句话的意思不仅仅取决于话语本身，还取决于说话的情境。同一句话在不同情境中，其意思可能是相反的。当一句话失去了情境，理解起来就会产生歧义。如果将一句话分若干个词语来说，而且中间没有显著的关联性的话，那么就非常难以理解了。

博物馆的考古展陈与之非常相似，就是要体现展陈标本的关联性，这里的关联性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或层次：一个是出土的关联性，一个是行为的关联性，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关联性，也就是上述三个context所指的内容。做得不好的展览往往只有标本的陈列，附上一个极为简单的标牌，显示标本的名称、出土的地点与时代。有些时候连标本的名称都是错的，出土地点与时代不准确也是有的。稍好一点就是加一个背景板，增加一些说明性的文字。如此孤立的展品要想让人理解，实在有点强人所难。还有的展陈体现的考古类型学的关联性，摆上许多器物，就像走在文物库房中。这样的陈列理念值得商榷，不是说考古类型学不重要，而是说这样做意义并不大。博物馆展陈毕竟不像在库房或研究室中，不大可能展示器物组合的完整演化序列。即便能够这样展示出来，其目的又是什么呢？告诉观众器物是如何演化的？估计很少有观众有这样的兴趣。

出土的关联性包括器物出土的剖面与平面关系，其中暗含的是古人的行为与意图。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在展陈07M23的随葬品时，做了一个极好的复原，在透明的玻璃展柜里，分层展示随葬品安放位置，一目了然。如今博物馆的考古展陈中有的墓葬是直接套箱搬运过来的，墓葬作为封闭的考古遗存单位，采用这样的展陈方式非常合适。类似的展示还有车马坑、祭祀坑、陶窑等。有些遗存面积太大，不适合在博物馆展陈，如聚落；还有的遗存过于零散，如屠宰场、石器制造场。大规模的遗存为了保护其出土关联，建立了不少考古公园，原地保存，一方面保留原真的场景，另一方面也为未来进一步研究保留了条件。然而，出土关联性大多时候仍然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够看懂。物质遗存自己不会说话，观众看到一座墓葬，知道其时代、发现地点，但这座墓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仍然是不知道的，此时就需要另外一种关联性，就是行为关联性。

行为关联性其实是一个泛称，指代通过物质遗存研究所揭示的真实过去，考古学上又称为“透物见人”。最直接的揭示就是行为重建，了解到物质遗存所指代的行为，比如通过动物骨骼上切割痕迹的存在推断存在屠宰行为，根据陶罐上的残留物判断曾经煮食过海贝，通过筛选植物遗存确定作物驯化的程度，如此等等的行为推导，都是直接立足于物质遗存材料，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可靠性是比较高的。单个的行为重建不免过于简单，人类的活动往往是由一系列行为组成的链条，比如博物馆展陈的滨海煮盐的过程，涉及一整套的工序，还有相应的器具。从单个行为到行为链条的重建，行为关联性延伸了，观众也更好理解。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考古学能够揭示的行为是十分有限的，离我们重建过去的目标十分遥远。

考古学希望能够实现管中窥豹的目的，或是像医生诊断一样，基于非常有限的特征，就可以确定病症。考古学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就需要有文化系统的模型、生态系统的模型（或者合起来称为文化生态系统的模型），或是进化的模型（社会进化或进化生态的模型）等。有了完整的模型，就有可能根据少量的行为重建证据去判断过去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古往今来，人们都希望有这样的能力，基于有限的现象去推断复杂的社会变化。商代人们利用钻灼甲骨，根据上面的兆纹来判断一件事的吉凶。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基于科学原理来呈现基于有限现象的全面推理。目前考古推理所依赖的复杂模型还存在于许多争议，其中涉及的行为重建推理的链条偏长的问题。因此，在行

公里，成为中国乃至亚欧大陆调查范围最大的项目。调查累计发现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聚落6000余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它既是中国考古学30年来飞速发展的见证，也极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进一步转变。

首先是对区域系统调查的可行性的验证。通过路查和记录3800平方公里范围内不同时期的各类遗址，项目组向我们揭示了从距今七八千年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距今2000年左右秦汉时期的聚落形态发展演变，以及每一个时期聚落的分布形态。这些结果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区域之内，人类社会如何从简单的、相对平等的社会逐步发展成为分层的、有社会分工的复杂社会，进而发展成为早期国家，最后融入到大一统的王朝国家的历史。201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鲁东南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发表了项目组前13年的调查成果。该报告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证明了区域系统调查理论和方法适用于中国。随着琅琊台等重要秦汉时期遗址的调查和发现，项目组进一步发现许多历史地理文献记载的秦汉时期的郡、县甚至乡、里都可以和考古调查结果相印证，通过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可以对聚落调查结果的合理性进行检验。可以说，在中国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大大丰富了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这既是山大考古学科的贡献，也是中国考古人对这一理论的贡献。

其次是遗址精细发掘理念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贡献。两城镇遗址三年的发掘面积仅有1000平方米，但进行了非常精细化的发掘。在第一发掘区发现了连续发展的八期居住遗存，为细致研究古代聚落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在发掘的过程中就邀请相关学科的学者到发掘现场，进行相关的样品采集，方便后续进行科技检测，为后来的考古发掘树立了典范。两城镇遗址发掘过程中开展的多学科分析研究包括地质考古调查、遥感考古、植物考古（大遗存和微体遗存）、动物考古、人骨古病理分析及稳定同位素分析、陶器及残留物分析、古酒研究、石器分析、人类活动化学残留物分析等。两城镇遗址发掘项目入选2002年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金奖，文德安还因此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成为唯一获这两项殊荣的西方考古学家。2016年出版的两城镇遗址发掘报告也荣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并在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期间先后有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200多位学者参与其中，获得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这一项目的经验不仅对山东大学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极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的成功经验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山东大学比较早地开始了多学科交叉研究，考古学研究的重心也较早地向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社会考古转变。新世纪初，山东大学就开始进行科技考古实验室建设，山东大学考古学实验室在人才梯队建设、实验室面积、研究门类、仪器设备等方面在国内都名列前茅，先后获批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基地、教育部环境与社会考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科技考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古环境重建与生业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等教学科研平台。

今天，科技考古和多学科交叉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手段。随着聚落与社会考古、科技考古等成果的不断产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式逐渐从传统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向社会考古学转变，从经验性研究向实证研究转变。新的研究范式依赖于考古发掘获取更多更丰富数据，不仅包括发掘现场获得的地层学信息，传统的类型学信息；也包括通过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人骨生物考古与稳定同位素研究、冶金考古等多种科技分析手段获取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古人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更丰富的信息。这些数据共同为古代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也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研究方向的转变。

迈向未来：从“跟跑”到“领跑”

“聚落与社会：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目的不仅仅是进一步总结和回顾过去30年国内外聚落考古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还希望与会学者深入探讨古代聚落与社会研究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事实上，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30年的历程本身就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经过了这30年的发展，我们在考古学研究的前沿领域里，有很多方面和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这得益于我们坚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推进对外交流与合作，学习西方好的经验。但随着中国考古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如何从“跟跑”到“领跑”，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关键课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的时代使命。

要真正领先，从“跟跑”到“领跑”，首先必须加强多学科交叉合作，推动新问题的提出和新方法的应用。在科技考古的前沿领域，中国考古学在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强化创新思维的培养与实践。其次，持续深化对外交流与合作至关重要。只有坚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广泛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并进行文明比较研究，才能更加有效地提升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

总之，30年的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不仅见证了 中国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在世界考古学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上升。未来，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深化多学科合作，力争在全球考古学研究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科技考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7月17日至19日，为庆祝山东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开展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30周年，山东大学在青岛校区举行了“聚落与社会：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140多位学者与会，是近年来聚落考古的一次盛会。始于1995年的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是我国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合作考古项目之一，见证和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会议的召开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总结和回顾过去30年中国考古学，尤其是聚落考古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古代社会研究的历程。

项目缘起：时代的选择

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既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众多机缘巧合的产物。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引进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理论与实践，促进了我国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初步建立，至20世纪末，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在我国主要地区建构并完善起来。这是一项划时代的成果，它使得我国考古学者能够思考年代学以外的诸多重要问题，探索中国考古学新的发展方向，标志着考古学的转型期的到来。

这一时期正值改革开放开始走向深入，国内外考古学界的交流越来越多地开展起来。1984年张光直先生在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分别进行了介绍国外考古学理论的系列讲座，后结集成为《考古学专题六讲》出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光直先生对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为探索中的中国考古学者带来了新的思路，以聚落空间分析为核心的聚落考古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中国考古学很早就有关于聚落考古相关的实践，如考古学家对半坡、姜寨等遗址的发掘，乃至于殷墟考古中宗庙区的发掘，以及历史地理学家对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分布规律的认识等，都是聚落考古萌芽阶段的有益尝试。到80年代后期，国内学术界已经在区域类型学说基础上探讨比区域类型更小的“小区”概念，甚至尝试在局部地区围绕史前城址做密集调查，探讨城址周边的遗址分布规律。尽管如此，以聚落考古理念指导考古实践还是要从张光直先生著作出版之后算起。张光直先生到山东大学进行讲座的考虑之一是他希望在山东开展合作考古工作，因为海岱地区考古事业起步早，已经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比较适合开展区域形态调查。当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张光直先生最终愿望并未实现。

聚落考古的实践就是以区域系统调查为基础的。1990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使中外合作开展考古学工作有了法律和政策依据。同年，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原则协议，双方共同在商丘地区开展考古工作，探寻商人起源。此后，中外合作考古项目越来越多，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的开放吸引来的不仅有张光直先生这样的著名学者，也有无数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年轻学者。这些年轻的考古学者同样渴望了解中国，希望有机会在中国开展考古研究工作。正师从张光直先生大弟子理查德·皮尔森（Richard Pierson）读博的文德安（Anne Underhill）就是其中之一。1984年，张光直先生来华讲座的同一年，还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文德安第一次来到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此后数年，她经常来中国，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为她的博士论文写作收集材料。但在当时，受限于当时的法律和政策，无论是张光直先生还是年轻的文德安都无法真正参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只能作为旁观者观察和学习中国的考古学进展。1992年文德安参加在山东临淄举行的中美古代陶瓷研讨班，认识了同样参加研讨班的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方辉，在后续的交流中，双方明确了合作的愿望，开启了文德安与山东大学的合作之旅。在接下来的两年间，文德安多次来到中国并访问山东大学，1994年身为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的她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蔡凤书、于海广、栾丰实等洽谈联合考古合作事宜。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将目标锁定在鲁东南地区，围绕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开展考古工作。两城镇遗址早在1936年就开展过发掘工作，出土了精美玉器和蛋壳黑陶器；鲁东南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文化发展水平高，文化序列也相对清楚。基于此，双方联合向国家文物局提出调查和发掘申请。双方还一致同意邀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Gary Feinman和Linda Nicholas教授夫妇参与进来，他们两人此前长期在墨西哥奥哈卡谷地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可以为项目组带来其他地区的成熟经验。

30年历程：成果丰硕

1995年，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启动。从最初围绕两城镇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到1998年至2001年双方联合对两城镇开展发掘，再到之后将区域系统调查的范围扩展到整个日照市，并进一步扩展到日照以北的胶州、高密、诸城等地，30年来调查覆盖范围超过3800平方



2013年田野调查照片

方辉 王庆铸

中美鲁东南联合考古30周年的成果与启示